

一個無產者的自傳

新故事



柳 寧 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一個無產者的自傳

在這本小冊內，我想要說一說我在共產黨內十年中的一點拉雜感想。

我是一個產業工人，我在十三歲就開始在近代的新式工廠中工作，那時我是在上海一個東洋紗廠（內外棉第八工場）裏。在工廠一方面，我是用一個成年工人的名義勞動着，但在工頭方面，我却只領到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的童工工資。十五歲那年（一九二二年），我以一个青年產業工人的資格，在上海參加了SY（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活動，不久就轉入CP（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普通黨員起，做了小組長和支部書記。當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爆發時，我在上海以一個十八歲青年工人的資格，做了CY上海地委的組織部長（那時SY已改為CY，當時有許多人一面參加CY，同時又參加CP我即其一）。但並沒有好久，我就離開了工廠，離開了上海，到廣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去做一個小「官」，并CP黃埔特支的宣傳部部長。那時是一九二五年的八月底，正是廖仲凱先生被刺的時候，也是在那個時候，

我在廣東開始認識了周恩來先生，和陳延年張太雷彭湃譚平山楊純安羅綺園阮笑仙鄧穎超這些先生們。在這以前，即在上海的時候，由於工作的關係，我認識陳獨秀趙世炎（施英）李立三陳代英張國燾毛澤東羅亦農蔡和壘秋白沈玄慮這些人。我之所以要將這些人名單開出來並不是如有人寫「我的朋友胡適之」那樣自以為榮，而是因為後頭要寫到我對於他們的印象。但我到黃埔不久，毛澤東由湖南到了廣州，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因為我和他在上海就認識的，所以到東山寺背通津三十八號去看了他一次。國民黨的二次大會以後，中央宣傳部還是由他代理，那時他就要我到中央黨部幫他工作，其時我自己也很想能夠有機會到廣州去工作，其動機說來是有點近乎荒唐，但我決不隱瞞，因為那時我很迫切地需要一個愛人，但在黃埔這一荒島上是永遠找不到愛人的，因為這裏除了鄉下姑娘（也不多）外，可說沒有女人，這樣，我就由黃埔軍校中出來，到中央黨部來了，在中央宣傳部當「名」一等幹事」。當我脫離軍校時候，曾經與黃埔特支的書記蘇榮臻（其時任政治部祕書兼組織科長）發生過一度衝突，因為他不許我離開黃埔，甚至以「黨」的權力來壓迫我，其實我之離開

黃埔，是經過特支會議通過的。到了廣州以後，我就住在毛澤東家裏，其時同事而且同住在毛家的，還有沈雁冰（亦即是現在的矛盾），蕭楚女（大麻子）等。最初我對於毛澤東是有相當敬意的，因為他是我們的老大哥，他對我也總算是另眼相看。可是經過了一個時期後，我對於他的印象一天天壞起來。在能力上，我不敢說他沒有能力，但無論如何，至少在那時候，宣傳部簡直什麼事也沒有做，我們每天只是看看報，談談天。我實在看不過那種現象，所以向他建議，主張把中宣部工作搖動起來，但他對於我們嚴肅的建議的答覆妙得很——他微笑地緩慢地說：「這又不是我們的黨部」。我當時就反駁他說：但你為什麼要在這裏當部長？既然當了部長，就該負責，不願負責，就該辭職。那天結果是不歡而散，從此以後，我們的感情，就惡劣起來。我就在民中支部（國民黨中央支部之簡稱）的支部會議上開始批評毛澤東的怠工。我原想以「自我批判」的武器來糾正一個負責人的錯誤，但是民中支部却給了我一個迎頭痛擊。原來民中支部是所有在中央黨部工作的CP份子都參加了的，其中包括了好些

跨黨的中央委員，如林祖涵、譚平山（他是民中黨團總書記）楊匏安、于樹德、毛澤東、江浩、謝晉、許楚魂、鄧穎超等等，但也有不在中央黨部工作的人，如張太雷、王一知、（張愛人）。陳啓修（即現在的陳豹隱）等。書記是劉伯垂（即劉芬，其時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他本是林祖涵的走狗，但處處地方仰承毛澤東的鼻息。因為在這些跨黨的中委中，毛澤東是一個比較出色的人。所以大家對他都很恭維。只有我這個不知拍馬的工人，給他來了一個嚴重的批評，當時由劉伯垂以支書名義給了我一個反批評，後由黨團幹事會給了我一個「警告」，罪名是說我「破壞負責同志的信譽」。這些批評和警告，對於我的刺激太大了，原來中國共產黨——我們工人階級的先鋒，原來是一個這樣腐爛的官僚集團呀！當時我就決定離開了中央黨部。但我退出中宣部以後，不久又以特殊的原因轉入中央軍人部。在黨的組織關係上，我也由民中支部轉入了軍委直屬支部，那是周恩來直接領導之下。那時我的公開職務是中央軍人的宣傳科長，周恩來似乎很賞識我。在工作態度上，我覺得周比毛嚴肅而努力得多。那時北伐軍已經誓師出發，在前方作戰，我們在後方也很做了一些工作。但那時我總覺得我們

的工作太空洞了。這年冬天，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路上是經過江西的，在南昌逗留了二個多月，到武漢的時候，時局已經很緊張，我的工作，也由中央黨部轉到號稱爲鐵軍的第四軍來。在第四軍我的公開任務是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四軍特別黨部的宣傳部長實際是四軍C P黨團的組織部長（黨團書記是政治部主任廖乾吾）這原是恩來派我去的，那時恩來似乎很看得起我，但我是一個不識抬舉的人。一到第四軍我就感到C P在軍隊中的工作空洞了。我到四軍不久，四軍就開到河南去打奉軍。在前方我們是竭盡了我們的精力，認真地工作着。當時軍政治部的支部書記是由我兼的，同時因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專門應付張發奎，祕書李富農不管事，所以實際上，整個四軍政治部是在我手裏，因此我覺得那時四軍的工作還做得不壞。可是我們愈是努力地幹，愈是遇到許多困難，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部（C P的，那時已在五大以後，中央軍部新設立），今天來一道訓令，明天來一個通告，內容不是說禁止吸收士兵同志，就是說不准宣傳階級鬥爭。今天指斥政治部做得太過火了，明天來批評我們的「官長工作」（即與軍隊官長聯絡）做得不夠。當初我很憤慨，以爲照中軍的指

示，那時政治工作就完全變成了姨太太工作。所以當第四軍攻克了開封，我們進了開封城的時候，我就與梅電龍（即梅龍彬，亦即梅劍父，其時任四十二師政治部主任）等談及這樣的工作我幹不下，梅亦表示同感。我們在開封沒耽擱幾天，就班師回武漢。在由開封到許昌的步途中，大概是在朱仙鎮或許田吧，又遇到中軍派來的聯絡員，傳達了一道命令，是批評我在西華縣華坡鎮辦一個萬惡不赦的公安局長馮國璧，說我做得太過火了，我們到了許昌，就與梅電龍等少數人在南洋花園裏開了一個非正式的會議，決定一回武漢，即向中軍建議，我們不能只做姨太太。回到了武漢以後，我看見武漢滿街都張貼了打倒許克祥的標語，由中央黨部省黨部到總工會，都有這標語。我是政治部的宣傳科長，實職所在，當即也來了幾個打倒許克祥標語，但結果，中軍却斥我不該貼這一標語，據說是怕得罪了第八軍，這真是笑話！當時我就去見恩來，恩來即留我們吃飯，在座的除了恩來和我外，有葉挺、周士第、廖乾吾、聶榮臻、李富春。恩來在席間一再解釋我們現在應該忍耐，我當時就很天真地說我不想做姨太太。但是恩來同志的答覆得妙，他說在必要的時候，不但該做姨太太，就是做妓女也

是應該。這，真弄得我無話可說了。那時李富春曾大笑，聲讚恩來見解之澈底，葉挺則只顧吃炒辣子雞，聶榮臻則批評我「幼稚」。那天我從恩來那裏出來，覺得很苦悶，就去找陳獨秀，陳獨秀的態度還比恩來嚴肅一點。後來在所謂「反機會主義鬥爭」中，周恩來是一位反機會主義的大將，但事實上，在機會主義時代，周恩來自己才是機會的大帥呢！我嘗說周恩來在機會主義的時代，是機會主義的大帥；在盲動主義的時代，是盲動主義的先鋒，這決不是誣蔑他的話。那時我會以中軍政治部名義，起草了一個文獻，這文稿事前是由我送給恩來審查後才拿來發表的，我自以為可以沒有責任。但後來汪精衛氏看了這一文獻表示不滿，就去找恩來質問，總算我倒楣，恩來找我來出氣，說我不小心，但文稿是經過恩來親自審查的，我當然不能負責，至少至少，恩來自己也該負點責任（其實這文獻本身並沒有毛病）但恩來却說：「我忙得很，當時沒細看」。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只有付之苦笑。不久，我們就去江西，在九江暫駐。當時整個的黨是沒有方針的，我們這些小黨員自然更覺得無所適從。其時武漢分共已經決定，問題只是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是否分共而已。但等到七月二十九日武

漢要人到了九江以後，卽上牯嶺去開第二方面軍的反共會議，就在七月三十日的會議上決定第二方面軍反共及查封九江國民新聞等。當時并決定扣留第二方面軍工作的四個人，鄒代英、高語罕、廖乾吾，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的柳甯——幸而同時參加會議的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因爲同情我們（其時未入C P），星夜祕密派人下山來通知我們，我們就在七月三十一的未明時候卽祕密離開了九江，這天晚上十時到了南昌。過了二小時，就聽到槍聲，原來歷史上的所謂南昌暴動發生了。我睡在鼓裏糊裏糊塗參加了南昌暴動。第二天早上，高語罕來拉我起來，要我到省政府去參加大會，我以好奇心的驅使，到省政府去一看，大廳上擠滿了人，其中有林祖涵、吳玉章、李立三、鄒代英、周恩來、張國燾、彭湃，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韓麟符等，中共的重要人，除陳獨秀翟秋白彭述之毛澤東外，可說大部分都到了。我一進去就由韓麟符招呼我簽名，在姓名下面，還要我署「浙江代表」四個字。我覺得好笑，這代表是誰推舉我的？我代表誰？我像做夢一樣，結果是成立了一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并推舉了一大批委員。那是八月一日的早上。晚上，恩來找我去談話，他是住在皇殿側的廂

兵營營部。我去的時候，他正在和江西省委派來的人吵嘴，那個人說恩來是官僚，恩來就大冒其火。我見了恩來，恩來就要我當總政治部的宣傳處長（後來還兼任了組織處長），并且要我當夜起草一個「八一革命宣傳大綱」內容是他指示的，大概是說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正統，而國民黨的領導者是孫總理，孫總理逝世以後是廖仲愷，廖仲愷死後，國民黨就失了正統，所以內部混亂，先有西山會議，後有甯漢分裂，又有各處清黨，現在革命委員會是繼任國民黨的正統的，恩來指示的大意是如此，但當時我就很天真的問：這裏的人都是CP，沒有一個國民黨，為什麼能說牠是繼承國民黨的正統呢？恩來對於我這發問顯然覺得有點突如其來，使他一時無從答覆，沉吟了一下，才說「我們同時還不都是國民黨？」當時我也還不满意這一答覆，但他僅着我做，當夜就遵照了他的意見，在砲兵營裏把這「八一革命宣傳大綱」寫好了，翌日用革命委員會名義發表。第二天，恩來又叫我去做一個「土地革命宣傳大綱」，內容也是他指示的，其中最精彩的一點，就是「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土地」。當時我又懷疑地問：如果人家有三四百畝而另立幾個戶名，我們怎麼能知道而加以沒收呢？恩來又被問得無話可

說，過了好一刻，他就說「這是一個原則」。第三天，恩來又找我去，要調我到第十師（蔡廷鍇那一師）去當政治部主任，但我拒絕了這一任命，第四天晚上梅電龍、歐陽繼修（即華漢，亦即陽翰笙），李民治（即李一氓）等很狼狽地由九江到南昌來了，第五天早上，我們就出發。

一路上，一方面是高喊土地革命和建立農村政權，另一方面却完全像土匪一樣，每到一個地方，老百姓大概都逃完了，我們就自己動手來搜查食物，所以每到一個地方，總是殺得雞犬不留，吃得瓜菜無剩。這樣的土地革命，實在革得我有點頭痛；這樣的國民黨正統，實在正統得有點貽笑大方，其時我以雙料處長的資格，和這些要人在一起，工作可說完全沒有，就只有到一個地方，即去捉雞吃，那時我學會了一個本領，即是我手裏拿着一條鞭子，只要發現一隻雞，我的鞭子一揚，這雞子準定被我打倒。所以那時我又得了一個「偷雞賊處長」的雅號。從南昌經臨川、宜黃、廣昌、石城、瑞金、會昌、尋鄔、長汀、上杭、永定、大浦、潮安而建汕頭，一路上至少被我打了五十個雞。在到瑞金的時候，恩來又找我去擔任二

十軍政治部的祕書，兼C P二十軍軍委書記。他憤慨地說：現在二十軍（賀龍部）是我們的主力，但二十軍的公開工作和祕密工作都做得很壞，所以派我去一方面負政治部的全部責任，另一方面負組織上的最高責任。但我到二十軍沒有好久，我們這一軍隊就在湯坑打了敗仗，全軍覆沒。在未打敗仗以前，即在我們初到潮汕的時候，就聽說現在黨的政治路線完全改變了，我們的革命委員會將改稱為「蘇維埃」，軍隊將改稱為「紅軍」，不要再做國民黨的正統，而且要求「打倒國民黨」了。這，我覺得完全是兒戲而不是革命！但這改革還沒實現，我們就全軍覆沒了！三萬五千多的武裝，除了朱德帶了七百多人逃北江去投范石生外，全都瓦解了。

我從戰場上逃出來，轉輾至汕頭，由汕頭到香港。一到香港，就被派往上海，聽說上海將要暴動，我們將到上海去做「蘇維埃」委員呢。但是我們一到上海，除了幾個四川人（如華漢之流）有交通來招待外，我們簡直沒有人來理會，因為那時上海中央交通主任（霍步青，是一個四川人，所以他只招待四川同鄉。例如華漢沒有一點病，不過住在旅館裏怕碰到巡捕，

所以稱病住到寶隆醫院，每天五元錢的住院費也是黨裏負擔的，而同樣是中層幹部的我們，却連吃大餅的錢都不給。候了十幾天沒有結果，最後是要我回廣州去，據說廣州要暴動了。於是我又從上海回到廣州，到廣州是十一月中旬，等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果然爆發了。事前我是一點不知道，那時我在教導團教書，同時奉了黨的命令，去參加一個國民黨的左派組織叫做「工農革命同盟」并做這同盟的宣傳部長。在暴動以前，C P把這同盟的幹部拉得緊緊的。比同胞骨肉還親愛。但是暴動一起來，這些幹部全被綁出去打了靶（一共槍斃了十七個！）。當時我就覺得這樣的革命革得實在有點那個。可憐這些平時自命左傾，討好共產黨的人，共產黨一掌握政權，就全部被殺了。暴動以後。我榮任了「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的秘書長但是這紅官只當一天半，張太雷就在第二天打死了。那天晚上，給了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平時我們所敬佩的惲代英（他是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那天下令將長堤一帶及泰康路一德路，凡是沿珠江及近西關一帶繁華馬路的兩旁房屋，一律放火燒焚。三個鐘點以後，廣州全城都變成一個火海，而所謂紅軍也者，就在火光熊熊中逃到海陸豐去了。慚

慌得很！我這位祕書長就沒有跟去。第三天早上，軍隊已進了城，我化裝成一個公子少爺逃出去一看，滿城都是死屍。可憐的無產階級，他們都是莫明其妙地去見閻王去了。當時我就深刻地感覺到CP是走上了直接屠殺無產階級的道路了，但我還是一個CP，在精神上，我真是感到萬分的痛苦！可是現在我是原諒當時的我的，因為我那時還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孩子呀！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由廣州逃到了香港；二十五日由香港啓程回上海。在香港動身的時候，我穿着豪華的西服，裝成一個「小開」（商店小主人）的樣子坐在新寧輪的特別官艙中。輪船將要開行時，海關（？）來檢查旅客，艙裏有二十多個工人裝束的人，被視為「共產嫌疑」而牽上岸去了。船中大家議論紛紛的談共產黨，罵共產黨如何殺人放火，罵得我面赤耳紅。我望着香港的綠得可愛的海水默默地想：為什麼連這些下層社會份子也這樣來反對共產黨？這個時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當南昌暴動失敗，我從香港回上海時，會到了邵力子先生，我們在談到中國革命問題的時候，他勸我多到那些民衆集合的場所例如茶館一類地方去

，聽一聽民衆對於共產黨的輿論。

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上海，翌日就會到了周恩來，在威海衛路壹春里那間小洋房子，我們談了三小時的話。他立刻給了我一個重要的任務，派我爲浙江省兼杭州市委書記，負責動及指揮杭州暴動的责任，那時他所告訴我的話，簡單的歸納起來，是下列幾點（一）過去我們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但他說這一錯誤是要陳獨秀負責的），八七會議已經糾正過來，現在已是武裝暴動和蘇維埃革命的階段；（二）現在中央已經全國劃爲五大暴動區域，江浙兩省劃爲江南區，由他負最高責任；（三）他給我看了一個中央的通告，列着開除譚平山的黨的黨籍（罪名是譚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在九江自由召集會議，作反中央的宣傳）并於湖南省委毛澤東等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我從恩來那裏出來，得到了兩個很深刻印象：第一印象是「黨」變得太快了；三四個月以前，黨在武漢提出「國共兩黨合作到底」的口號，在南昌暴動時，還要更說是繼承國民黨的正統的，現在却要以國民黨爲第一個反革命目標來攻擊了，這似乎有點近於兒戲；特別是恩來同志的態度變得更快。他無論在什麼時代，態度總是那樣堅決；

在四個月以前，即在南昌皇殿側砲兵營營部，他堅決說中國革命非繼承國民黨正統不可，現在威海衛路資春里，却又堅決地說非打倒國民黨不可。同樣的堅決，却完全是相反的立場。第二個印象，是「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鐵律，在中共更是明顯。譚平山爲什麼要開出黨籍呢？因爲他是革命委員會的最高領袖，而革命委員是被葬送在汕頭的海裏去，毛澤東爲什麼被留黨察看（一種半開除的處分）呢？因爲他領導的「八百萬湖南農民」在兩湖秋暴中打來只剩了三千。但也幸而還有三千殘農兵，所以黨籍尙能保存，否則不如譚平山者幾希。但反轉來說，如果毛澤東的暴動成功了，毛澤東何嘗不是黨皇帝（我昔日之言，今日驗矣！毛潤之老友亦可自豪矣）？

我懷着一顆說不出是喜是悲，是苦是甜的心情，和梅電龍爬上了滬杭路的火車，直向杭州奔馳。經過了松江，火車就馳入了浙西平原。這是我的故鄉——可愛可戀的故鄉。嘉興的城垣，硤石東山的塔影，臨平的山峯，這一切一切對於我都是太熟悉了。當火車駛進杭州的城門，在城站停下來時候，我望一望車站外熙熙攘攘的情形。突然之間，感到一種深刻的

悲哀襲擊着我。廣州的慘劇，像電影一樣在面前開映着，現在我是到了我的可愛可戀的故鄉了。我是來幹什麼的？榮歸故里嗎？不！我現在是成一個「野人」了。回家嗎？我沒有家，我的家早已被革命的洪潮冲碎了。我是來指揮暴動的，於是說，我是負着一個任務，要來把這和平的美麗的故鄉大燒大殺一下。燒殺得像半個月前的廣州一樣，這是光榮嗎？這是革命嗎？這是必要嗎？我不能答覆。這還需要思索。一個馴良的黃包車夫把我從城站拖到湖濱的旅館裏。我在路上看到那個黃包車夫的背影，想到鋪滿在廣州街上的黃包車夫的屍首。我真不禁要流淚了。

這個時候，浙江省委的書記是夏曦，梅電龍是省委宣傳部長，但省委因為杭州城裏站不住，已經搬到寧波去了。我一到杭州，就要計劃暴動，當初我還不知到杭州是一個什麼情形，以為至少杭州還有幾百個黨員，有幾千羣衆。但到杭州一調查，真正的黨員連我包括在內，只剩了七個——杭州市委的七個「吃黨飯」的人。城裏不僅沒有一個黨支部，連黨員也找不到一個。C P（青年團）也完全破碎了，大約還剩三四個人，黨和團湊起來勉強可以湊成十